

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人文精神与 现代人本主义思潮

赖干坚

什么是人文精神?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应是恒定的、具有普遍性的,这样,我们才能够对它的内涵加以把握,并且能够对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文学的人文精神进行比较研究。人文精神的核心,可以说指的就是关注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命运的一种广博的情怀和意识。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人文精神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这是说,不同民族由于生存环境和社会文化的差异,人文精神有所不同;即使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人文精神也会有所发展变化。西方各国,地域相近,社会经济文化相似,又有相同的文化渊源,特别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后,形成了统一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的人文精神大致相同,这是不足为怪的。

文学之所以被称为“人学”,就因为文学以审美形式体现了某个民族在一定时代的人文精神。若把现代派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加以比较,我们会发现,西方文学人文精神的变化是与传统人文主义向现代人本主义的转换分不开的。因此,要了解西方现代派文学人文精神的实质和特征,就必须研究现代派文学

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关系。

一、西方文学的转型与人文主义的嬗变

众所周知,西方近代文学是伴随人文主义而崛起的。在人文主义思潮推动下,西方作家把审美的目光转向人生,以表现人生、推进人生为文学的宗旨。这是西方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古希腊罗马文学人文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根据人文主义思想,西方作家相信人之所以高贵,就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动物。不过,17世纪法国的哲学家、散文家巴斯噶开始考虑到人的复杂性,他说:“向人过分显示出他多么像禽兽而不显示出他的伟大,这是危险的。向人过分显示出他的伟大而不顾到他的卑鄙,这也是危险的。让人认识到他既卑鄙,而又伟大,这才是有益的。”^①从人文主义的观点看来,人性中的兽性和人的本能欲望等非理性意识相关;人只要遵从理性的指引,对非理性意识加以制约,就可能形成高贵的品格。所以,人的理性和非理性,或者说神性

① 巴斯噶:《感想录》法文版第6部分,第418节。

与兽性如何取得协调统一是近代作家一直关注的问题。正是对人性内在矛盾的考虑,西方近代作家一直把“惩恶扬善”当作文学的崇高使命。塑造高贵的人物和揭露批判现实中的败行恶德成为古典文学的崇高使命。

除了张扬理性之外,西方人文主义作家还倡导仁慈、博爱精神。雨果在长篇小说《九三年》中声称,“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狄更斯在长篇小说《双城记》中,也表现了相似的主题。这些作家之所以强调“仁慈”和“博爱”的精神力量,主要因为他们坚信,人类的本性是善良的。

当西方文学从近代转向现代时,传统的人文主义已为现代人本主义所取代。这种转化深深根植于19世纪后半叶以来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之中。也就是说,传统人文主义所倡导的价值观念,诸如人性善、理性主义、乐观主义、个性自由、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仁慈、博爱等等,已和发展了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可以说,现代人本主义思潮是现代西方社会矛盾激化、精神危机的产物。

属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流派主要有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以及哲学人类学等等。这些流派的共同特征是,强调哲学必须以“人”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强调哲学的任务是给人的生存、人的发展、人性的解放等“人的问题”以合理的说明。从现代人本主义哲学的观点看来,哲学即“人学”。现代人本主义的各个流派或者以人为核心建立起庞大的形而上学的思辨哲学体系,从人的角度去说明整个世界;或者深入分析人的内在的心理机制,从而使哲学具有较浓厚的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特色。将哲学的对象从外部世界转向人本体和人的个体、自我,用非理性的方法重新确立人的价值,成为现代西方许多哲学家所热衷研究的主题。这就是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主义等早期的人本主义哲学流派产生并流行的社会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现象学——存

在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这不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和严重的精神创伤,还由于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稳定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进一步加深了各种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现象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胡塞尔企图通过自我意识的纯粹内省来建立一种寻求永恒真理的现象学方法,以此来拯救西方的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萨特将世界的本质归结为个人的主观存在,将外部世界的一切,视为敌视人的东西予以绝对的排斥。萨特尤其强调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他认为人的行动选择是不受任何必然性制约的,人完全可以自由地创造和决定自己的本质。因而,有人认为,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以人的名义对当代社会的抗议。

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由于适应了当时的社会情境,在二战前后几十年间风行于德、法等国,并对整个西方文化界和艺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现代派文学与现代人本主义思潮是在同一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如果说现代人本主义哲学以思辨的逻辑的形式表达了现当代西方的精神危机,那么,现代派文学则以形象的、审美的方式营造精神危机的幻象,而且现代派作家是在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引导下去营造这种精神危机的幻象的。

现代人本主义思潮对现代派文学产生了渗透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现代人本主义哲学对主观精神的强调,现代派作家把主观精神和内在心理作为文学的表现对象,倡导文学创作的主观性、内向性。意识流小说着重表现人的深层心理,超现实主义文学强调表现潜意识、梦幻,表现主义主张主观精神对事物内在实质的把握,存在主义强调自我的非理性意识对客观现实的介入,等等。

第二,基于存在主义关于人的本质是绝对自由的原理,现代派作家把传统人文主义所认可的个性自由推向极端,倡导自我中心主义。传统人文主义使个性自由和仁慈博爱

并行不悖, 现代人本主义则把自我的存在和绝对自由看作世界的本质, 因此一切以个人的自由为转移。从传统人文主义观点看来, 世界人生是善与恶对立的, 世界对个人来说还是友善的。而以现代人本主义观点看来, 世界是荒谬的、与人为敌的, 自我与世界的对立是命定的。因而, 现代派文学流露出反社会的倾向。

第三, 从现代人本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出发, 现代派作家排斥传统的理性法则, 强调对审美观照对象的直觉把握, 主张文艺创作的直觉主义。传统人文主义在认识论上强调理性主义, 相信事物的形成、发展具有内在的逻辑性, 人可以通过揭示事物内在逻辑性去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 从而认识事物。因此, 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强调真实的客观性。现代人本主义却把非理性意识看作世界的本源, 并且强调对非理性意识的直觉把握。因此, 现代派作家把艺术真实看作是主观精神的外化, 倡导艺术表现的非逻辑性。

总之, 在现代人本主义思潮推动下, 形成了文学与现实疏离的局面, 文学日益与哲学联姻, 文学日益具有人生启示录的意味。

二、现代派文学人文精神的导向

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深受传统人文主义思想浸淫, 而现代派文学却是在现代人本主义思潮推动下产生的。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学与现代派文学的人文精神毫不相关, 恰恰相反, 它们的内在精神倒是相通的。这是因为无论是传统的人文主义, 还是现代人本主义都关注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解放。但是, 我们又必须注意到它们之间的时代差异。传统人文主义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显示了人的力量和智慧, 因此, 人的意识开始觉醒了。要肯定人性, 就必然要反对神性, 为此人文主义作家要竭力表现人的自然本性是善的、美的。作为人文主义核心思想的“人性论”, 无疑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但是, 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毕竟与人文主义的唯心史观存在尖锐的矛盾, 随着历史的发展, 人文主义的人性观和社会观已难以继, 传统人文主义为现代人本主义所取代, 乃是历史的必然。

现代人本主义, 如果从最早的倡导者费尔巴哈算起, 也已经历 200 多年的历史。人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 始终围绕着人的本性及其解放途径的探求。尽管以存在主义为代表的现代人本主义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人本主义, 而趋向于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本主义。但是, 现当代西方文化危机却又赋予现代人本主义不同于传统人道主义的历史内涵。这主要表现在它的超自然的人性论、人本主义的历史观、非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和自我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等方面。在现代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 现代派文学的人文精神呈现出如下趋向:

(一) 表现人性恶的忧惧。

现代人本主义的各个流派对人的本性有各自的解释。弗洛伊德主义把潜意识、人的本能欲望看作是人的内驱力, 认为人若不受现实约束和道德规范的制约, 任凭本能欲望驱使, 必然野性大作。弗洛伊德根据人的动物性与人类文明的协调关系来分析人的心理结构, 认为和本我、自我、超我三种心理人格相应, 人的心理活动是由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三个相互制约的层次构成的。在弗洛伊德看来, 决定心理人格的是具有巨大本能力量的潜意识, 所以人的本性是恶的。而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 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人的存在指的是自我的非理性意识; 存在先于本质。一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全靠他自己的自由选择。这种选择不受任何先决条件的制约, 是绝对自由的。也就是说, 自我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一个人爱干什么, 就干什么; 成为懦夫或英雄, 不过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弗洛伊德认为, 人类文明既是人类创造的, 又反过来成为对人类自身的约束。而存在主义则强调人的主体的超越性。总之, 现代人本主义把人的本性看作是超自然的个体存在的非理性属性;

它既具有巨大的创造性,又带有排他性、破坏性;与其说它是利他的、仁慈的,不如说它是利己的、恶的。显然,现代人本主义的人性观,是对传统人文主义人性观的反拨,是对现代西方社会非理性化的感应。和心理学、哲学对人的本性的探索相呼应,现代派作家借助艺术手段表现了对人性恶的忧惧。例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长篇小说《蝇王》,通过一个寓言式的故事表明,儿童并不象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天真烂漫,当他们脱离了文明社会,失去了老师和家长的管教、约束之后,无异于嗜血成性的残暴的野兽。作品还暗示,每个人心中都隐藏着一个黑暗的王国,战争的根源在于人的残酷的本性。

(二)表现“异化”的惶恐、人的绝对孤独感。

从莎士比亚到巴尔扎克,无数古典作家在人文主义思想指引下,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欲横流、弱肉强食、尔虞我诈以及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作过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们以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痛斥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力图借助艺术的力量,纠正社会的弊端,使人性复归。但是,他们常常痛感世风日下,文学无回天之力。

现代作家从现代人本主义观点思考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从世风日下的表象看到人的异化,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归结为人的本体问题。美国学者埃·弗洛姆在《孤独的人:现代社会中的异化》一书中,把存在主义的原理融化于现代心理学中,把“异化”看作是现代人对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的一种体验方式。伊恩·罗伯逊则从社会学角度,把“异化”界定为“人们在自己无力支配、并认为是在压抑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条件面前所体验的一种束手无策、孤独和毫无意义的感受。”^①

“异化”成为现代派文学一个突出的主题。尽管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作家侧重的内容不同,表现方法也不一样,但他们都通过对“异化”的表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加以猛烈抨击。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对现代人的异化有

敏锐的、独特的感受。他的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变形记》、《地洞》和长篇小说《审判》、《城堡》,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人对异化的惶恐、自我的绝对孤独感,或者表现人被抛进一个陌生的、异己的世界后无能为力、束手待毙的困境,或者表现在混乱的、荒诞的世界中,求索无路、一筹莫展的可笑情景和痛苦心境。

(三)表现精神家园的失落与寻求。

二战后,存在主义风靡欧美。在存在主义哲学影响下,反抗传统文化和主流意识的思潮席卷欧美。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后,正如存在主义者所揭示的,人被赤裸裸地抛到世界上,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代派作家笔下的人物反叛传统习俗和价值准则,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但他们不知道追求的是什么,更不知道怎样去追求。50年代,英国“愤怒的青年”、美国“垮掉的一代”,还有不属于这些流派圈子的作家的作品,象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莫里森的《看不见的人》、索尔·贝娄的《奥吉·玛奇历险记》、《霸王汉德森》等等,都表现了反叛传统文化、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以及精神家园失落后空虚、焦虑和落寞心境。

(四)表现生存的困境与人生的虚无感。

在存在主义哲学基础上,产生了关于人与荒谬世界关系的所谓“荒诞哲学”。加缪是荒诞哲学与文学创作的集大成者之一。加缪认为,人生的意义、自我的价值是在反抗荒谬的世界中实现的。他的名著《鼠疫》把“鼠疫”作为残害人类的邪恶势力的象征,表明人生的价值就体现在和邪恶势力的斗争中。但是,他认为,尽管人有能力反抗邪恶,却无法消灭它。世界的荒谬正在于此。加缪毕竟肯定人对荒谬世界的斗争,后现代作家却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人的主体性的瓦解与人生意义的消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在后现代作品中,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

^① 伊恩·罗伯逊:《现代西方社会学》中译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266页。

情绪显得更为突出。

三、现代派文学人文精神的特征

在现代人本主义引导下,现代派文学的人文精神的体现了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特征。

首先,现代派作家审视人生问题的哲学高度与对人生的非理性、反理性解悟形成明显的悖论。

如前所述,现代派作家把世界的复杂现象归结为人的本体问题。但是,正是在对人本体的理解上,现代派作家有别于以传统人文主义为依托的浪漫主义作家和现实主义作家。对于后者来说,人本体即自然人性。浪漫主义者把资本主义造就的城市文明看作是违反自然人性的东西。在他们心目中,天真无邪的儿童和宗法制度下的农民,还没有受到资本主义文明的损害,还保留人性的本真状态。他们为之讴歌并且把它理想化。现实主义作家却主张以冷静的态度面对现实人生,客观地再现资本主义文明对自然人性的扭曲,从而引导人们正视现实,避恶从善,使人性得以复归。比较而言,浪漫主义者相信主观的热情、想象胜于理性法则。现实主义则强调对现实人生的清醒认识,要求主观热情、想象依从客观规律和理性法则。其实,自然人性本身就体现了理性精神。例如,在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不看重金钱而看重真情的欧也妮,在作者看来,就是自然人性,也就是理性精神的体现,而她父亲老葛朗台把金钱看得比自己的性命和亲情还重的守财奴习性,便是资本主义文明对自然人性的扭曲,是违背理性精神的。

正是在对“自然人性”的看法上,现代派反叛了传统人文主义观念。首先,现代派与其说相信人的本性是善的,或是亦善亦恶的,倒不如说相信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他们认为,传统人文主义作家提出“人性复归”的主张是可笑的。其次,从反“自然人性”观出发,现代派否定了“理性法则”。在他们看来,人是

非理性的东西,世界的混乱无序就是人的非理性的体现。人来到世界上,注定要陷入悲剧的命运,问题不在于人性和复归,而在于人自身如何救赎,个人如何在这个非理性的世界里生存下去,个人的价值如何实现,等等。

上述表明,现代派把社会问题看作是人本体的形而上的问题,以对人生思辨解悟代替了具体问题的辨析。就此而言,现代派作家对人生的审视具有理性意向。但是,他们认为,世界是无法把握的,人为何来到这个世界上?人来到世界后怎么办?人要到哪里去?不同流派的作家以各自的方式提出这些问题,但是,他们仅提出问题,却拒绝提供答案。他们声言,作家不是政治家、社会学家和道德家,解决社会人生问题不是作家的任务,作家只是根据自己对人生的感悟,提出问题而已。其实,这不过是他们无法解答人生问题的托辞。他们根本不相信世界的客观性,不相信自然和社会的规律性,以非理性、反理性的方式对待具有高度理性的命题——现代派文学人文精神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

其次,现代派文学在表现对人的尊严和命运高度的关注时,流露出强烈的危机意识。

在传统人文主义引导下,西方古典文学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经历了从信仰到怀疑的过程。一般说来,从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西方作家竭力张扬人的价值,歌颂人的尊严和伟大。哈姆雷特、浮士德、鲁滨逊这些巨人式的英雄就体现了人文主义作家关于人的价值观。到了19世纪,人的尊严和伟大已受到现实的嘲弄,但是,作家坚信人的神性必然战胜兽性,善良必然战胜邪恶。狄更斯、雨果和托尔斯泰虽然已不可能象他们的先辈那样塑造巨人式的英雄,但是,他们以悔悟的贵族、资产者形象表明,人自身的灵性能战胜兽性,善良终究要压倒邪恶。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罗曼·罗兰笔下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可以说是传统人文主义精神的回光返照。

现代派文学是在传统的价值观瓦解过程中崛起的。本世纪初,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人的尊严和伟大已荡然无存。

现代派作家是带着严重的精神创伤,面对满目疮痍的世界,思考人的尊严和命运的。

如果说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对人的尊严和伟大表示怀疑时,还相信人自身的灵性会压倒兽性的话,那么,现代派作家则在痛惜人的尊严和伟大以及人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失落时,陷入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绝境。这是因为,当他们对人性恶表示忧惧时,意识到人类自身悲剧的根源,感到人无法自救,人的悲剧命运是注定了的,无法改变的。同时,当他们醒悟到人类自身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时,抹去了人自身头上的光晕,在他们看来,人非“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而是虫和兽。对传统价值观的重估和拒斥,不

可避免地导致精神家园的失落。对现代派来说,世界已成为可怕的荒原,人注定了是孤独的、平凡的,也注定了要陷入凄惶、焦虑的困境,就象笼中的困兽那样四处奔突,却找不到出路。在经历了中世纪漫漫的黑夜之后,人的意识开始觉醒时,丹麦王子哈姆雷特对世世的险恶思考着“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如今,在经历了几百年人类辉煌的文明之后,现代派作家又在叩问人的命运。应该说这并不是历史的循环,而是西方人文精神在现代历史条件下的变奏。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本刊来稿格式简略要求

一、正文

打印与手写均不限,但手写应以稿纸清。

引文如超过 50 字应另起一行,加引号,左右均不缩格。

文内小标题单独占一行;段首小标题或序号等前空两格,后空一格。

文中夹注的页码和著、译者名等用括弧圈示。

外文专用名词、术语等第一次在文中出现时应译成中文,并随文在括弧内注明外文全名;书名用斜体或加底线,文章名标引号;英文人名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为准;地名以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地名翻译手册》为准。

数字除作为词素构成定型的词、惯用语、缩略语或具有修辞色彩的语句外,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文末注明著、译者姓名和单位。

翻译文章除循上述有关要求外,应注明版本出处和原作者外文全名,并附原文。

二、注释

注释可采用脚注或尾注方式,中西文均可。

书写格式应为:“作者:书名(出版地点:出版社,出版时间),页码。”;其中,书写西文姓名时不将姓提前;西文作者名后用逗号,书名用斜体或加底线,文章名标引号。例如:

王佐良:《英国散文的流变》(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第 X 页。

Northrop Frye, *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57), p. 52.

Richard Wright, "Bright and Morning Star," in *Short Stories: A Critical Anthology*, ed. Ensaf Thune and Ruth Prigozy (New York: Macmillan, 1973). pp. 387-88.